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SanYu CongGao Wo Yu ZhongGuo XianDaiShi

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

王桧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

丛书



SanYu CongGao Wo Yu ZhongGuo XianDaiShi

三余丛稿——我与中国现代史(下)

王桧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下册)

第三编 抗日战争的研究

第 一 篇	论“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421
第 二 篇	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425
第 三 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抗日战争	434
第 四 篇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 民族传统	453
第 五 篇	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	470
第 六 篇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77
第 七 篇	抗日战争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	491
第 八 篇	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特点	498
第 九 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	517
第 十 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52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2

第十一篇	胜利的抗日战争	
	——中国历史的光辉篇章	552
第十二篇	凝聚民族力量 珍重历史光荣	558
第十三篇	为世界和平 为人类福祉	566
第十四篇	中华民族的壮举 惊天动地的伟业	
	——写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	569
第十五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论中国的复兴	575

第四编 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及其他问题的研究

第一篇	关于中国现代史体系的一些想法	587
第二篇	从教学和研究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的建立	593
第三篇	中国现代史教材的编著与科学体系的建立	601
第四篇	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614
第五篇	发挥民族凝聚力的诸问题	625
第六篇	关于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632
第七篇	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	642
第八篇	评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兼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648
第九篇	《钱玄同年谱》序	665
第十篇	《天论》论“天”	673
第十一篇	就王夫之的“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讨论中国哲学史	
	研究中的问题	690
后 记		708

第三编

抗日战争的研究

天龍山寺記

第一篇 论“九一八事变”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就年年在“勿忘国耻”“还我河山”的时局感召和精神动员下，纪念这个激愤人心的日子。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人纪念“九一八事变”以鼓舞抗日救国激情的重要意义才有所减弱，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全国抗战状态了。现在这个历史事件已经过去80多年了，无论是被侵略国中国还是侵略国日本，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事的变迁，客观地、公平地、正确地评论这一事件对中日双方的影响和在中日两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更为容易了，在这里从三个方面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第一，在日本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在1945年8月，而失败的因素早就开始孕育。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开始，到1942年在太平洋战争中转胜为败止，它的侵略政策步步得逞。军国主义分子踌躇满志，以为“大东亚共荣圈”已经形成，“大东亚新秩序”已经建立，日本的东亚盟主地位已经确定；然而从此以后，日本进行的战争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一败涂地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又向南向西扩大侵略，并制造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但也就从这时开始，日本的一只脚已陷入自我毁灭的深渊之中。1933年2月《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国民一致之感觉，为惧日本之蚕食鲸吞，致吾死地，故其与日本所争者，为此根本的存亡问题，非日本变计划，改方针，中国必与之作长期之奋斗。”“一年以来，竟证明日本军阀主义与中国国家的存在断不能两立。”（《中日问题之根本讨论》，《大公报》1933年2月15日）这些话实际上说明：日本要灭亡中国，中国就不能不起来斗争；日本用战争侵略中国，中国就不能不用战争来对抗。《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

韩非也说：“兵者，凶器。”这样，日本的国运就被捆在侵略战争这个“凶器”之上了。战争有它的一般性规律，不打到一方彻底失败，战争是不会停止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在发动了“七七事变”之后，又发动了“大东亚战争”。它在战争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直到彻底失败。

今天回过头去观察历史，把“九一八事变”看成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的始点，是合乎逻辑的。

第二，在中国国民党方面。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片中国领土，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多难兴邦”，中国也出现了各阶级各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客观形势与主观要求，抗日救国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这股潮流正是国家向上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客观形势，违背人民意愿，初则采取不抵抗主义，继而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面对日本的侵略，或是干脆退让，或是应战之后再来个退让，而对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则大力进行镇压。蒋介石南京政府把主要军事力量用在“安内”上，不仅一次又一次地进攻红军，同时又出兵攻打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南京政府一再退让，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更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反对，一味与日本谋和。他在1934年12月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反复申述“中日两国共存共荣之旨”。他向日本掌权者呼吁，不要“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而要“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在蒋介石看来，中国人的“时代使命”不是团结抗日，而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这样的所作所为，招致人民的强烈反对，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此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有所改变，“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进行了抵抗，但蒋介石集团敌视人民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为了保住他们的政权，对人民的抗日动员仍然严加防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违背“时代的使命”和人民的要

求，不仅损害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使自己陷入窘境，使它在中国现代史上不会有长久的生路。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多次做出决议、发表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同日中共北平市委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号召广大的工农兵和劳苦群众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2年9月18日，中共北平市委发表《为“九一八”一周年紀念宣言》，号召一切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侵占平津”。大批白区共产党人参加了抗日反蒋群众示威运动；许多共产党人参加了义勇军，随后又组织抗日联军，进行武装抗日；还有共产党人参加了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这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政策上存在着“左”倾错误，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目标，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中国共产党改变关门主义政策的开始。同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了“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时，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八一宣言》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从此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高涨。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力主和平解决、全国一致抗日救国，表现了对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忠诚。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日战争的有力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形势：中国各政党、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谁能领导和推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谁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可以发展为大的政治力量，就会有光明的前

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行动,符合国家的主要任务,符合人民的“时代使命”,它也就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最快地发展了起来,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在一定时间内,中日两国的历史和这个事件密切相关。这个事变后的一段历史清楚地说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经被他们自己点燃起来的战争之火烧成灰烬(不过企图死灰复燃的人还没有完全绝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的时候,违背民族的历史使命和國家的首要任务,这就使它丧失了人民的拥护,随着时间的发展未能避免崩溃的命运;中国共产党顺应“九一八事变”后的时代潮流,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坚决奋斗,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这就使它成为后来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这是今天纪念“九一八事变”的意义之所在。

第二篇 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中国现代历史上经常遇到的一个名词。但是这个概念的内涵还应该先说清楚，这个问题说清了才好说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通常说的抗日根据地即敌后解放区，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一定地域上的政权，抗日的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人民和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政权和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概括起来说，所谓抗日根据地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定地域上的人民、政权和军队结合而成的抗日力量的整体。我们所说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指的这个整体。我们这里讨论抗日根据地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个抗日力量整体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谈。

一、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有两面性，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它一方面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自己的统治，害怕坚持实行不抵抗政策会使自己淹没于全民愤恨的浪潮中；另一方面又害怕人民革命力量会在抗日浪潮中壮大起来，威胁自己的生存。前者决定了它抗日的一面，后者决定了它谋求同日本妥协的一面。这种两面态度决定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基本政策。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就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条件下显现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招来全国人民的猛烈攻击，蒋介石因此下台。“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蒋介石重新上台，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是蒋介石处理对日外交和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

“才是抗日来攘外”。在当时实际上是只“安内”，不“攘外”。

1934年4月，在蒋军围剿中国红军的内战正酣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旨在独占中国的谈话，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这年秋天，蒋介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于1934年12月发表在《外交评论》上。该文是蒋介石对日基本政策和处理内外关系准则的全面阐述。蒋介石是站在国内政治这个基地上阐明对日关系的，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长。该文的一个基本思想是“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人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但是目前中日关系正在陷入“僵局”。为了“免使愈走愈趋绝路”，以致弄得双方“同归于尽”，必须打开这个僵局。蒋介石反复说明，如果僵局恶化下去，双方就要“同归于绝灭”。我们认为这个“同归于尽”或“同归于绝灭”的问题，是了解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关键所在。这里说的双方不是中日两个国家，而是指的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双方会“同归于尽”呢？他说，现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已绝不容当局不抵抗而屈服，国民党“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若再欲以武力威胁中国而得到屈服的结果，可说是不能达到目的”。又说，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和平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如何”。这就是说，如果日本无休止地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国民党在抗日救亡运动压迫之下，不能不抵抗，相持下去，日本不能灭亡中国，反而会被拖垮，而国民党统治也会因为“内外交侵”而崩溃，这样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就会在相争中“同归于尽”，而得利的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他苦口婆心劝说日本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要压迫太甚，对中国要以“道义”“相结合”。而他自己的对日方针则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这就是：在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的时候，中国不绝交，也不宣战，留有妥协的余地；但也不能正式订立卖国条约。这个方针成为国民党政府对日的基本方针。后来它长期坚持这个方针，一直到“七七事变”以后还是如此。蒋介石又说，“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対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完全相应一贯”的。他在执行“四不”外

交方针时，对日本的武力进攻采取某种消极的抵抗，以表示他的不屈服，并以此作为贯彻“四不”的一种手段。这同时也是为了搪塞舆论的谴责，掩盖屈辱妥协的实际。这样他可腾出手来进攻主要敌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人物，从根本上说，是把本国的革命人民看成势不两立的敌人，而把自己的命运在一定条件下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论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上看，还是从这个政府的实际活动上看，都没有动员全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的积极主动的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事扩大。次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一个“自卫抗战”声明书，但不向日本宣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国民党政府投入大量精锐部队进行抵抗，并宣布要“持久抗战”。但是它的“持久抗战”是为了“促起国际共同制裁日本”。就是在战役上多支撑一段时间，等待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干预，以求得“光荣的和平”。所以它在上海抗战的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国际干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通过德国与日本进行妥协活动。蒋介石同意以日方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只要求“恢复战前状态”。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仍然不对日本宣战。

此后，国民党政府一直保持着多条渠道同日本联系和进行秘密谈判。宋子良和今井武夫的秘密谈判，蒋介石派唐生明到南京与敌伪联系，戴笠与周佛海之间的电台联络，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从以上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取得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彻底解放，依靠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相反，“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它既定的革命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掠”。中国共产党一贯坚定地主张武装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废除日本在华一切特权，收复一切失地。它不止嘴上说而且实际做。“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组织和领导下，中国亿万人民参加了抗日战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抗日战争的发动、坚持和胜利，特别是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都是离不开共产党的。

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中国军民实行坚决抗战的基地。它是在长期抗战中逐步实现彻底胜利的基础，是抵制妥协投降活动、维持全国抗战局面的有力因素。如果没有抗日根据地这个强有力的因素，中国的抗战就会出现两种结局：一种是，国际国内条件对蒋介石集团实行抗战不利、而妥协投降对它有利时，它就会对日妥协投降（是否全国都跟着它投降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另一种是，在“拖”（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过程中，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侥幸取得了胜利，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仍然不会走上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

这是从政治路线上对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的考察。

二、从军事战略上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国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当时的中国，掌握全国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被抗日的潮流拖着抗战，一方面随时准备着同日本妥协。坚决主张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不止领导着广大的群众，还有自己的地盘、政权和军队，即有抗日的根据地。这不仅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政治状况，也形成了一种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军事状况。抗日根据地就在这种战争形势中发挥着它特殊的作用。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所形成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论述。这些论述大致如下。

大而弱的中国，被小而强的日本所攻击。这种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遇到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和武装抵抗。但是掌握中央

政权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却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但又缺乏控制的能力。在敌占区内敌人力量空虚的地方，就可以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这样的游击战争也就成为在敌人后方的有战略基地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进行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这种战争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它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这种广大的有根据地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争取抗战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大因素。

抗日根据地的存在，打乱了敌人作战的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形成了敌我双方军事态势的多层的复杂的包围与反包围，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从整个战争来看，由于敌处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的地位，无疑是我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来看，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像下围棋一样，敌对我、我对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根据地，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如果能在国际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和美英苏等国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就形成了又一种对敌人的包围。到这样一个反法西斯的天罗地网形成之日，也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之时了。

在以上的论述中，就我们中国的地位来说，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亚澳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二，“在这个‘做眼’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军事上说，同这种包围

反包围的军事态势，同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分不开的。以中国、西太平洋、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几重包围中被打败的。就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失败来看，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中说，“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这是使日军许多次“肃正讨伐”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日军占领的只有点和线，这就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破坏了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使它把华北搞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不能完成。这对中国的大后方起了稳定作用，对美英军队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作战是巨大的支援。

三、从中日战争的实际进程看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归结点之一，就是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起来。这种变化不论是从日本统治者的战略决策方面，还是从国民党的战略决策方面，都表现出来了。

先说日本方面。

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称重庆政权可以参加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这是日本放弃以武力摧毁国民党政权的公开表示。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重新研究了战争指导方针，做出如下的决定：日本“以攻占汉口、广东〔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别防止急躁”。“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1939年3月30日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做出《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的决定。其中提出的“完成持久战的方式”之要点，“一是在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之主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建设，一是对占据地区所施加的

军事压力，两者要互相结合。目前在重要的治安地区确立治安和进行建设尤为重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华北的兵力有所减少，但对华北的作战却更加重视。《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着：“‘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按：引号中的话为一个日本高级军官在当时的话）。这就是说，华北担负着建设和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任务，它在形成东亚解放战争重要一环的使命中，其比重逐渐增大。”

从以上日本的战争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如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作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说，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在华各部队转入持久战略态势”。此后日军“积极地在各地实施了治安肃正作战，特别是在华北，讨伐行动紧紧与推进治安工作相配合”。第二，1938年秋季以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来虽然发动了对国民党的作战，但那或是政治谋略的配合（对华施加压力，迫蒋投降），或是为了巩固占领地区，或是为了开辟中国以外的新战场做准备（如准备南进）等。豫湘桂战役是日军最大的一次进攻，但在战役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是保守的。第三，所谓占领地区的建设，就是在政治上巩固日本在占领区的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即把占领区搞成“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为此，就要在占领区“确立治安”，就要进行“治安战”。总之，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进攻，把确保占领区的作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就随着整个战局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再从国民党方面来看。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在湖南召开南岳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确定武汉广州失守后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而召开的。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多次讲话。他说，自武汉失守以后，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期。抗战的第二期是所谓“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但他不具体地谈如何转败为胜、如何积极对日作战，而是大谈国民党政府要整军建军、加强战斗力。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比较清楚地说出了他的意图。它提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